

# 略谈纪晓岚的小说观念

刘保忠 李军锋

(延安大学文学院 陕西 延安 716000)

【内容摘要】大学者纪晓岚既有小说实践更有小说理论。在小说实践中他“以学问为小说”完成《阅微草堂笔记》,在小说理论部分,他一直持有传统的小说观念,以史学作为小说的文体依据,坚持“子部小说”的文体观念,“信而有征”成为他取舍小说的准则。本文是对他的小说观念所作的简略疏理。

【关键词】纪晓岚 小说 小说观念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09)12-0089-03

纪晓岚名纪昀,生于雍正二年(1724),卒于嘉庆十年(1805),曾主修《四库全书》,有《纪文达公遗集》、《阅微草堂笔记》等,是名满清史的著名学者与才子。他一生十分重视学术研究而轻忽文学创作,尤其对小说持有鄙夷、否定的态度。以至于《四库全书》将小说统统“黜而不载”,并斥之为“诬蔓失真”、“妖妄荧听”、“猥鄙荒诞”。其晚年(六十六岁至七十六岁)却持续十年用来创作了小说《阅微草堂笔记》,前后言行的矛盾,使我们有必要对其的小说观念作以关照。

在纪昀生活的时代,正是蒲松龄《聊斋志异》风靡之时,纪昀对此颇有微词。鲁迅先生曾记述他的门人盛时彦所录其语:“《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虞初以下天宝以上古书多佚矣,其可见完帙者,刘敬叔《异苑》,陶潜《续搜神记》,小说类也,《飞燕外传》,《会真记》,传奇类也。《太平广记》事以类聚,故可并收,今一书而兼二体,所未解也。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今燕妮之词,媒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又所未解也。……留仙之才,余诚莫逮其万一,惟此二事则夏虫不免疑冰。”<sup>[1](P150)</sup>显然,这不同于明末清初由金圣叹、张竹坡、毛宗岗等人推波助澜而形成的“心营意造”的小说创作观,与钱钟书先生的“第须遥体人情,

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臆造人物、虚构境地”的小说理念也全然不同,而是以古代文体分类为据来批评《聊斋志异》,虽有胶柱鼓瑟之嫌,但其议论涉及到的小说理论问题值得研究。

第一个问题是小说的名与实问题。纪昀的两条批评意见都与此有关。他认为小说是述见闻的文体,《聊斋》体裁上混入了《青凤》、《田七郎》等传记体文章,犯了体例驳杂之病;而手法上《聊斋志异》又近似于“戏场关目”,虚构、描写超出见闻范围,与文体的基本性质相矛盾。那么,在纪昀的理解中小说之实是什么呢?

在小说概念演化的最初阶段,小说一词中的“小”,大致有两层含义:一指其文化品味,是相对于“大道”而言的“小道”。如《庄子·外物》中:“……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荀子·正名》中:“凡人莫不从小所可,而去其所不可,知道之莫之若也,而不从道者,无之有也。……故知者论道而已矣,小家珍说所愿皆衰矣。”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小说之“小”是贬词,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然案其实际,乃谓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与后来所谓小说者固不同。”<sup>[1](P1)</sup>二指文体形式,是“丛残小语”。如东汉桓谭的《新论》:“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sup>[1](P1)</sup>而“说”字的含义也有两层:一作说服讲,含有劝善

\* 作者简介:刘保忠,延安大学文学院教授。

之意,并且以劝善为大宗;一作愉悦讲,悦耳、悦心,尤其是当小说成为说话四家之一时,此一层含义昭然若揭。

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中共列儒、道、阴、阳等十家,小说家名列最后,并且认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将小说家视为等闲。他解释道:“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蕘狂夫之议也。”班固的“稗官说”影响深远,为历代文人所重视。不过,班固语焉不详,稗官是何意,与小说有何关系?一时间成为疑虑。学者余嘉锡有专门考证,指出稗官就是先秦的士,是朝廷中的低职,负责广泛收集街谈巷议,献纳于君以广视听。从而推测班固因小说家所作浅率,多闾里俗语,故推其源于稗官。今天,我们似乎可以这样理解:“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正是对其文化品味的评价,“必有可观”、“缀而不忘”正是因为其含劝善之义。而“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则是对其出处、源头的阐述,指出小说的源头在民间。至于位于十家之末而视为等闲,则是相对于道术而言,相对于“修齐治平”的治国之理而言,相对于“安身立命”的学问而言。至班固时代,“小说”已成文体名称,但不是文学样式的文体称谓。历代治学者大都将其归在“子部”之中,谓之“子部小说”,与“杂家”、“杂史”、“传奇”等文类相共处。明人胡应麟指出,“《汉书艺文志》所谓小说,……盖亦杂家者流,稍错以事耳”,“子书流也”。

至此,我们大致可以说纪昀是根据《汉志》中“道听途说者所造也”一语。他以“子部小说”的定义来衡量“文学小说”的现实,无怪乎凿枘不合了。纪昀的失误使我们认识到观念的巨大的惰性,也认识到清中叶小说仍存在名实相左的现象。

第二个问题涉及到叙事观点。纪昀对此有过认真的考虑。他指出,叙事要合乎主体的观察范围、角度,要有相应的限制。如樊嫪叙赵飞燕事不妨“猥琐具详”,元稹自述艳遇便“约略梗概”,叙事观点与作品的真实性相关,倘不顾叙事应有限制,就会引起读者的不信任,怀疑“何从而闻见之”。纪昀对《聊斋》的批评,包括对其叙事观点的指责,似乎显得迂腐狭隘,但他对小说叙事观点问题的思考却有渊源。何以能使小说叙述获得强有力的真实感?

受史传传统的影响,古代小说观念中本有“实录”之意,到乾嘉之际,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实录”本是史学中的重要原则,小说学中的“实录”原则直接来源于史学,正如《汉书·艺文志》中所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要“献纳于君以广视听。”所以强调“实录”。传统小说学中的“实录”原则主要有两种:一是强调事件本身的真实性,所谓“信而有征”;一是把小说视为对“传闻”的忠实记录,尽管记录的态度是客观的,可是记录的内容则因“传闻异辞”而可能有“不实”、“失真”、“错讹”之处。如干宝在《搜神记序》中言“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亦安敢谓无失实者哉”;洪迈《夷坚乙志序》中自谓“稗官小说家言不必信,固也。信以传信,疑以传疑,自《春秋》三传则有之矣,又况乎列御寇、惠施、庄周、庚桑楚诸子汪洋寓言者哉!《夷坚》诸志,皆得之传闻,苟以其说至,则受之而已矣”。可以看出,文史之初,还是在其后的文化演进中,史学视野下的小说态度,一直都是疑虑重重而左右恍惚。

清中叶的小说观念在强调“实录”原则时的主导倾向则属于第一种。《穆天子传》、《神异经》、《汉武帝洞冥记》、《拾遗记》等小说在前代的著录中有时被归入史部,在纪昀主修的《四库全书》,由于对史部的“实录”原则要求更高而将这些“恍惚无征”、“其言荒诞”、“悠谬支离”的篇目退置于小说家类。这种目录分类方式实际上是其强化史学观念的产物,与其说是就小说本身而言,还不如说是为了使史部体例更加精严而采取的著录方式。正是由于史学原则对小说观念的这种强大制约作用,最为纪昀称道的是那些“信而有征”的小说。

当他著做《阅微草堂笔记》时,则尤为看重“实录”。他详言传闻之由来,“某先生言”、“某某日”、“某某为余言”之类的句式比比皆是。从表面上来看,这似乎是强调小说学中客观记录传闻之“实录”原则,其实不然。如前所述,干宝、洪迈、陆容等人一方面表明自己忠实记录传闻的客观态度,一方面又对小说之“虚”予以一定程度的承认。而在纪昀那里,客观记录传闻是最起码的——惟不失忠厚之意,稍存劝惩之旨,不颠倒是非如《碧云騞》,不怀挟恩怨如《周秦行记》,不描摹才子佳人如《会真记》,不绘画横陈如《秘辛》,冀不见槟于君子云尔,但仅仅如此还不够,还要对传闻进行甄别,摒除“诬谰失真、妖妄荧听”之传闻,强调要记录那些“信而有征”的传闻。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

会明白,他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详言传闻之由来正是要表明这些传闻的“信而有征”。除了这种方式之外,他还采取了另外一些方式来竭力表明自己所记录的传闻“信而有征”:有时,他对传闻予以推理以表明自己记录的真确性;有时,对那些失真的传闻,他要以有力的证据予以纠正;有时,对那些不可靠的传闻他还要进行质疑与批评……刘知几在《史通·采撰》篇中宣称“恶道听途说之违例,街谈巷议之损实”,这是以史学家的眼光对小说之“违例”与“损实”予以苛责,可以看出,纪昀对小说“实录”原则的强调庶几近之。

第三个问题是虚构、想像的问题。在干宝、洪迈、陆容等人的表述中,虽有“恍兮惚兮”,但对小说之“虚”予以一定程度的承认,而纪昀对此最不理解,因而提出“燕昵之词,媒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的笔墨由何而来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清初评论家金圣叹那里曾以“动心”、“设身处地”说作出了回答。纪昀很可能不屑于读金氏著作。纪昀的疑问是与他崇实黜虚的学问之道一致的。他的时代正是乾嘉之学兴盛之时,正如梁启超在论清中叶的考证之学时曾言:“其治学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佚等等”<sup>[2](P135)]</sup>。风会所趋,明末清初已被普遍接受的“心营意造”的小说创作观,此时便动摇起来。乾嘉以后,小说创作与小说理论都陷入了低谷,这未必不是一个原因。

贵“实”贱“虚”的小说价值论和“资考证”的小说功能论与清代的学术思想有很大关系。乾嘉时期建立了“汉学”学统,形成了“实学”学风。乾嘉学者对宋学最为批判的就是宋儒不通考据而自出己意地妄谈心性义理,如黄宗羲言:“明人讲学,袭语录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更滋流弊,故学者必先穷经,然拘执经术,不适于用,欲免迂儒,必监读史。”又曰:“读书不多,无以证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sup>[2](P145)]</sup>在指责宋儒的空疏无本、自出己意的同时,盛赞汉儒的家法

师承、考据功夫。这都是就儒家的传统学术——经学而言,是重新确立经学的权威地位。这样一来,自明中叶尤其是晚明时期,“人人皆可为尧舜”、“满街都是圣人”之说则不为社会接受。清中叶,清初学者们治学主张之影响、官方对思想文化统治之巩固与加强、乾嘉学者们“汉学”学统之建立这三者合流,形成了“经学盛兴”、“海内人士无不重通经”局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非圣”、“不经”之说的严厉指斥比比皆是,这也可看出经学权威地位的重新确立。只不过,乾嘉学者有着“通经无不知信古”、“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学理逻辑,于是史学以及由经史之学而生发出的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辑佚、目录、金石、博物之学等考据之学也就随之大盛了,形成了当时所谓的“实学”学风。至此,小说再以“才子书”之名目来抬高身价已不可能,于是便千方百计地打扮出“学者书”的样子。很明显,贵“实”贱“虚”的小说价值论与“资考证”的小说功能论正是强调对小说的“学者化”。这样的小说观念对当时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极大作用,出现了“以学问为小说”的局面。

纪昀小说观念的另一明确表述,当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小说家类一》中的言论:“……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他还说:“班固称: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如淳注谓: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然则博采旁搜,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杂废矣。今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见闻,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而不载。”当然,其所录小说均属文言小说范畴,入子部中,《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通俗小说则不收。无疑,这是一种从文化角度分类的目录编写法,而非文体角度的编写。以经史文化为圭臬的观念放射于小说,故而称小说为小道,这种小说观念与由清末传入,而今已被广泛接受的小说观念始终存在相对错位的状态。

参考文献:

[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